

〔联邦德国〕洛塔尔·施佩特著

转向未来

Wende
in die Zukunft



科学出版社



转 向 未 来

——在通往信息社会路上的
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洛塔尔·施佩特 著

关惠文 译

白靖宸 汪 昊 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Lothar Späth
Wende in die Zukunft
Die Bundesrepublik auf dem Weg
in die Informationsgesellschaft

本书根据 Rowohlt Verlag GmbH,
1985年11月第1版第2次印刷译出

转 向 未 来

——在通往信息社会路上的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洛塔尔·施佩特 著
关惠文 译 白靖宸 汪昊 校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7.25印张 168000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058-0276-3/F·241 定价：3.60元

中文版前言

多年来，我极为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先生去年（1988年10月6—8日）访问巴登-符滕堡州的情景，在我的印象中仍历历在目。1989年9月间，我将第四次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清楚地表明，巴登-符滕堡州多么重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自从10年前我第一次访华以来，我们两国之间已经在经济、科学和文化方面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我想把在1986年建立的辽宁省和巴登-符滕堡州的合作关系作为这种亲密合作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提上一笔：我们的“联合声明”增强了我们“促进和扩大经济领域里的合作与贸易，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及其他适当领域里不同形式合作”的意愿。这种合作的新形式的思想基础是：只有在广阔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友好的关系。

未来是自行来临的——但进步不会自行来临！关键性的政治任务在于根据人的合理要求和生活价值来建设未来——为未来争

得进步。

谁想在时代的历次变革中坚持一定的方针，谁就得依赖于方向的辨明。谁想不仅容忍未来，而且共同创造未来，谁就必须参加有关“什么构想才能指导我们针对未来的行动”的讨论。我们应该把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途径视为一种“公众的事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必须在有尽量广泛的人士参加的条件下公开进行——而且要把各种不同的理想方案进行比较。

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里我曾批评过“人为的神话”，并以今日政治实际的特别狭小的活动空间与之作了比较。为了提防对政治文化的失望和损害，我曾提出警告说，如果很高的愿望与其实实现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太大，这种失望和损害便不可避免。政治的目标必须产生于政治发展过程的本身。这里存在着对所有公民带根本性的参与可能性的问题。

当然，我们就走向何种未来的问题取得共识的过程，是以对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总体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的。有关目标和未来前景的讨论不能脱离现实。

多种多样通向未来的途径在今天的现实中已初露端倪；首先必须确立这些发展方向，并依其意义加以估量。要考虑：哪些东西是决定未来的力量，是孕育着未来的发展路线？从而选取哪一个发展方向？以及：我们愿意不愿意沿此方向前进？

我就是想用我的《转向未来》这本书触及和强化有关目标和未来前景的讨论。我的出发点是探讨迅猛发展的技术变革的结果，特别是通讯和信息技术领域变革的结果。对社会和政治来说，从这里会得出哪些结论？我写作此书的核心意图是促进有关我们社会未来的讨论，而这个社会是以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不断加强的、其本身结构不断变化的社会。

可以把这一点看作对一种理想前景形成的贡献，这是政治家和公民在迎接基础技术创新对经济和社会提出的划时代挑战时可

以遵循的理想前景。就这方面来说，这里所陈述的种种考虑也包括“对技术成果的评价”这一部分。面对“新技术”，我们在行动上究竟有哪些选择？我们只能走这条认真负责与新技术打交道的路。

认真负责的行动——这意味着：灵活多变的行动。既不是一切都统统禁止，也不是一切都统统准许，而是在最佳可能的信息条件下区别什么有利和什么有害。

此外，还需要有一个反映整个未来世界方向的理想前景。在人们的奋斗目标中，各种理想当然都应有优先权，但也得拒绝不切实际的非非之想。它们必须使人认识到一种价值的等级。作为其基础的方案，必须反映那些最重要的单一问题之间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无理想前景、无基本道德立场的政策，迟早会陷入应接不暇的境地。如果每一个政治决策和每一个行动都是按照一个理想前景安排的话，那么，它们就会被当作马赛克镶嵌在一个引人联想的图案里去。

本书各章里所展现的理想图景建立在下列假设的基础上：老式的工业社会——烟囱工业、机械化、流水线、考勤钟和大生产等——正日益加速转向另一种更多由微电子技术，特别是由信息和电讯技术支配的社会，如荧光屏工作岗位，数控机床和设备，主要依靠电子计算机进行的学习、设计、规划及生产，专家系统，远距离通讯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一切。我曾借用“信息社会”这个概念来说明呈现上述新技术的社会。

向“信息-服务社会”的过渡，是与深刻的技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转变紧密相联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向震惊不已的人们、向各类企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强烈的挑战。生产愈益为电脑和自动化装置所承担，人则将越来越多地从事计划、控制和检验方面的信息活动。

今天在许多“工业国家”里，从事信息服务的人已多于从事

产品生产的人。恰恰是这种高度信息化的服务职业——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广告专家、经纪人、新闻记者和艺术家等——今日占越来越大的比重，而在许多与传统的产品生产有关的职业中，则只能呈现出触目惊心的衰败。

随着上述提到的数量变化而来的是质的转变，那种以机械装置为特点的思想必定得到不断的补充，甚至由网络化体系的思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代替。这包含着人在自然界的“网络化”关系中对自身的思考。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迎接向信息社会的转变呢？信息社会也需要一个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思想方法，公路和铁道必须通过信息网络，通过知识传播的新设施加以补充；必须按照信息时代的新要求建立学校和大学，组织进修和培训；有关信息的基础设施，决定着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所有这些观点，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

对政治家来说，挑战则在于，要通过建立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来减轻结构转变所造成的社会冲击，在于通过社会契约引导有关的人们做出相应转变。这决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任务。新的基础设施不仅涉及信息传递手段的建立——光纤电缆、通讯卫星直至信息网络——还涉及新知识生产和应用结构的建立。

在对老式工业化思想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生产方法和产品进行比较时，特别要强调一种观点的作用，这就是减轻环境负担的可能性问题，田野和风景线的破坏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原料和能量的消耗在减少。噪音和有害物质的危害已有所减轻。改革为经济和生态的平衡提供了机会。面对威胁生命的环境问题，这是决不可低估的进步。

满有把握地预言我们发展道路的方向，这是极为可能的。尽管未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但并不是一种既定计划方案的结果。在这里，我想强调：即使对我来说，未来也不是可以预测的。未

来和无把握同冒险和机会一样是不可分割的。

难道这种认识会迫使人们放弃预测吗？大概根本不会。出于对未来的责任感，我们必须把可掌握的知识残片一再重新拼合成某个图像，这个图像表现了有关未来的决定的实现依据。

有可能照亮未来发展的光——即使有些朦胧，也是重要的，但这还不够。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要把人们对明天社会政治的理想预期与今天的现实相对照。从现实投影和理想前景的对照中，可以认识到明天朦胧的行动领域。

如果我们把这项工作同未来问题联结在一起，以致影响到今天的决策——采取措施或搁置一旁，这些决策都决定着我们的发展，那么，关于未来的讨论就不能回避现实，而是更紧密地结合有关现实展开讨论。

十一年以后人类将进入新的世纪。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考虑这件事吧。

洛塔尔·施佩特

1989年2月于斯图加特

译者序

《转向未来》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8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之一。作者洛塔尔·施佩特是巴登-符滕堡卓有成效的州长。巴登-符滕堡经常被人们称作模范州，用德特勒夫·布洛克在《德中论坛》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的话说，“即使用欧洲的标准衡量，这里的经济产出率也是最高的，该州的出口额远远超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平均数，失业率也最低”。

从书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作者对建设未来充满信心，他坚信：欧洲人有能力迎接工业超级大国的经济与技术挑战。事实上，目前整个欧洲正在聚集力量千方百计地开拓新技术。《转向未来》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技术等各方面详尽而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联邦德国如何向信息社会迈进的问题。这本书被视为联邦德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

译者只不过是经济学、社会学爱好者，因此，译述这样一

部涉猎十分广泛的重要著作实感力不从心。幸亏译后经经济学家白靖宸教授和经济学家汪昊先生细心校订，特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编辑范国鹰教授对照本书的英文版，对译稿做了精心审阅加工，前后历时一年之久，共五易其稿，该书译文才能以今日的面貌呈献给我国读者。对于他们诚挚的合作，译者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者在第三次校改过程中，承蒙经济学家李波、德国语言文学家孟成玉、计算机学家郑锐各位先生不吝拿出他们的本书部分初译稿供译者参考，在此谨向三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译者才疏学浅，译文中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殷切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关惠文

1989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译者序	7
前言	1

第一篇 政治文化评述

第一章 资产将在十年内耗尽	
——公众兴趣的起落	8
第二章 作为未来几代人受托者的政治	
——政党的作用	14
第三章 对未来的担心：文明能否幸存？	
——大组织的危机	19

第二篇 在通往信息社会的路上

第四章	我们必须考虑哪些价值观念转变?	
	——向信息社会的发展	30
第五章	加强智能,但不是智能	
	——电子计算机	36
第六章	物极必反	
	——新技术的推广	41
第七章	未来的工具时期	
	——联合系统	46
第八章	应用范围的高速扩大	
	——接受新技术	50
第九章	文化环境中的矛盾开始缓和	
	——集成技术	55
第十章	新的独立浪潮	
	——灵活的劳动界	65
第十一章	信息社会的广大天地	
	——服务行业	77

第三篇 旧的价值观念——新的秩序制度

第十二章	是旧价值观念的新兴吗?	
	——未完成的启蒙	102
第十三章	要想减轻自然界的负担,我们必须向 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	
	——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什么?	109

第十四章	以牺牲我们未来生活保障为代价的社会福利 ——福利怪兽的危机	115
第十五章	对人的因素的再发现 ——捍卫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型社会经济政策	121
第十六章	披着新外衣的老问题 ——市场和国家	132
第十七章	只是一种幻想吗? ——一个和解的社会	155

第四篇 欧洲：小大陆

第十八章	统观欧洲领土，欧洲是太小又太大 ——欧洲实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180
第十九章	按客观要求集中力量 ——多元化的欧洲	193
第二十章	斗争中的和解 ——东西方关系的政治学	205

前言

著书立说的政治家易于被人们怀疑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或对自己的职业有错误的理解。难道在政治领域不是比其他任何领域具有更多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促进新生事物的形成吗？在这里作这么多解释干什么？面对如今堆积如山的出版物，谁会在一位政治家严肃地看作一位著作家呢？政治家应致力于行动，致力于具体准备的准备和实施——至于反映和评论，自有足够的其他人去管。

然而，我在这种分工上积累的经验越多，我对此就越发怀疑。事实上，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通过民主授予的政治“权力”是相当有限的。它往往是由旨在于进行诽谤的政敌或旨在于歌功颂德的政友所扶起的权力的稻草人，而不具备坚实的決定力量。立法行为很快就在州、联邦或欧洲共同体一级受到其他主管部门的限制。由于普遍拖拉的司法审查过程的不确定性，许多行政决

定并没有给做出决定的人们或受决定影响的人们造成必要的透明度。一夜过后，宣传媒介的大标题揭示的种种消息——从垃圾箱里发现某些毒品，到涉及公众利益的某些人物的财产调查的消息，都可能改变和决定政治的日常进程。在广泛的领域里，政策的决定只不过是预先科学决策的派生物——如在环境保护、科研资助、公路规划、机场扩建以及电站选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政策的活动空间趋向于零。

我们的社会采取了许许多多限制政治权力扩展的监查措施。权力的分散是传统最深的因素，新闻自由是最有影响力的，许多公民要扮演一种更为积极的政治角色的期望增加了，这可能是个最有决定意义的长期因素，因为它可以最佳方式使立法行动得到保障，又使公众舆论的形成成为可能。

从法制国家和民主的角度来看，对此无可非议。如果人们期望反馈过程复杂而又费时的政治能象某种理想的机器那样，你一按那极其令人满意的“立显”电钮，便可以立即看到结果，那么，事情便会变得很棘手，甚至自相矛盾。事情往往是这样的，那些抨击优柔寡断政治的公民一旦他们自己成了当事人，他们将反对把事关主权的决策交给最高法院去裁决。同样的新闻媒介，一方面呼吁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要有更多的行政决策权力，在社会福利方面针对各种情况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公正，同时却又抱怨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必须指出：这里并不是谁来承担过失的问题，也不是推卸政治失误的责任。然而，一个社会起码应粗略地知道它要干什么，它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对每一个生产步骤都进行检查，你就不能期望这种生产能达到只有中间检查和最终检查那样的生产所具有的速度。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肯定在生态上比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更有价值，只不过它不能行船。把某一目标绝对化，必然不可避免地排除其他的目标。

这听起来如此简单的事实，照我看来，绝对没有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众意识中扎根。

相反，社会一政治问题的讨论存在着某种分裂：负责确定目的和需求的各种协会、社会利益集团和新闻界头面人物们各执一词。将他们的主张综合起来，几乎包括了公众期望一个现代工业国家应该具备的一切东西——清洁的环境，人道的技术，新的有保障的就业机会，社会公正，减少国家干预，减少公债，增加国家和私人投资，改善基础设施，与社会上层更直接地联系，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减少统计数据。

导向和达到这一目的的责任——此事无需多想——当然是政府，因为归根到底这是政府的首要内容。政府也拥有必要的“执行权力”。

政府本身不仅仅是接受这样的神话——动员选民的唯一办法是选举投票。政府的趋势是开列一整套控制机制清单，并自觉自愿地把大部分社会目标的阐述工作让给处于直接政治决策过程之外的舆论制造者们去干。第一，这较为容易，第二，没有时间进行“哲学探讨”，第三，只有具体的行为才能作为公共生活中的成绩证明。

完全可以预见：这种“责任领域的划分”后果是灾难性的。最大的公共标准是提出各种要求，而又不对其实现承担政治责任，最小的公共标准是最终完成的实绩，这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日渐积累的失望导致进一步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这些目标越来越被紧迫地提醒，即由于它们不能实现而产生的反面效果使前途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存在着这样的倾向：把一些向正确方向迈出的微小步骤和细微的改进假冒为“完成指标”的重大突破。于是，这种螺旋型发展到头来将产生这样的后果：信誉丧失，毫不妥协的原则性批评的增加，以及再没有相互沟通能力的分裂的政治文化。

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处于这样的状况。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存在着向这一方向发展的令人不安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容许政治家把有关这些目标的社会讨论单托付给利益集团或宣传媒介。他必须形成自己的长远看法，眼光要大大超出或甚至完全超出他目前力所能及的范围。他必须努力使人们理解到，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各部分的总和永远少于加总。如果我们尽力把某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压缩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没有给进行比较、确认或者说妥协、和解留下任何余地，我们就在思想方法上走上绝路了。

本书的基本用意，正是广泛地探讨对立观点的“和解”机会。我这样做首先为了指出在我们的公众讨论中，日益严重的片面性和日益加深的绝对化所造成的种种令人困扰的影响。正当我们在联邦德国把目标绝对化，抱着不变的观点，抛弃我们认为不完善的解决问题模式时，我们周围的世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以惊人的速度共同发展。各国都在草拟长期的国家远景规划；为了实现这一规划，政府、科学界、经济界和社会形成了广泛一致的认识。在全世界，各企业都在进行通讯与信息网的建设，从基础设施角度来看，这些通讯与信息网在不远的将来便会比国家的交通运输更为重要。新的合作轴心可能首先在太平洋周围出现，那是符合经济实力法则的，那可以造成全球范围的政治实力转移。

根本的经济和技术变化间歇越短，对战略性目标和发展规划的需求就越大。然而，战略要求高度的组织性以及妥协与合作意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部署来实现，而必须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来达到。我们是否会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个政治或社会艺术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基本信念和我们的模式的可信性。

过去，联邦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社会模式的动力也行。个人对物质的不断追求和自由企业制度，足以作为刺激的因素了。